



儒学的方法与理论创新：促进人类道德与世界和平

(2007-8-8 16:01:10)

作者：成中英 转载于：《国际儒学研究》第14辑

检视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祸乱相循，战火不断。所谓人类历史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展开。人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的集合。如何解决人的世界中人的需求(包含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的需求)与发展问题,实现人的内外和谐,群己和谐与整体和谐,来补救历史的缺失,开创人类新的历史,建立人类相互的信赖与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乃是当前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人类潜能与人性与智慧必须接受的严峻考验。我们所处的时代显示出人类世界发展的诸多可能,是战争还是和平,是一霸独大或是多元共荣,是猜妒先下手为强,还是信任协商,携手并进。最近有关朝鲜问题的六方会谈的鲜明成果,令人感奋,燃起人们对人类和平世界的建立的希望,也说明人类和平世纪的到来需要人类刚毅的意志、圆融的智慧的持续投入,也展示了中华文化与儒家哲学的中和精神价值运用得当的魅力与高度人文关怀的有效能耐。但在另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的游魂复苏,美国实用主义的独我情结难解,以及欧盟道德理性精神的脆弱展现,在在都为21世纪的人类世界和平的发展投下难以测知的阴影,令人深深隐忧。

人类和平世纪的到来涉及到人类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但人类经济全球化发生了两个效果：一是人们只关心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人的整体价值,同时也忽视经济发展带来的物化现象,忘却经济发展应实现文化发展的目标;另一个效果是全球化中的普遍化与科技化带来了人们对个别文化整体与人文传统的轻视,造成人心的贫乏与精神的失落,丧失了生命的原创力量。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理想的经济合作与协调一蹴而就相反的,它似乎带来更大与更多的竞争甚至冲突,而每一个竞争,每一项冲突都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才能克服,甚至付出代价后也不能克服。如何合理竞争,如何克服冲突,考验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智慧与思考能力。举例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国家建设,常常被认为会带来对世界和平与现状维持的威胁。一国经济发展当然会带动其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否必然会造成世界和平与对其他强国的威胁呢?又如何来说明甚至证明中国的强盛将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而非其相反呢?显然,中国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图,又如何体现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奉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如何积极的转化为充实而光辉的文化大国与教育大国,彰显理性、正义与仁爱,而不只是停留在经济利益层面的考虑上也是中国当前最应关注的问题。同样,如何善用经济建立和平开发、和平安保的秩序,促使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协助弱小民族,提携落后地区,改善人类生存的环境,消除污染与恐怖,促进世界和平,而不只是维护世界现状,才是中国发展成为先进国家所必须要严密考量的问题。

在以上两问题上,儒学如何发挥其重要的功能,又如何面对此两问题进一步的作出自身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方案,则是当代儒学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唯有如此,儒学方能为世界的和谐秩序与和平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本文先探讨儒学的理论建树,再略论当前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经济全球化的内在与外在关联。

儒学发展至今,可说理论创新不多。大多时间,停留在阐述反本开新,接受或发展民主与科学一般命题上面。在哲学史上,当代儒学可说尚未能综合前贤,囊括百家,评章中西,贯通内外,形成体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儒家哲学既无所宗,最后也只落得概念的守成,学统的纷争,而无法落实于应用与实践之中,不但未能提供行为的指导原理或合理依据,而且往往走向闭关自守,自以为是。目前儒学的理论创新的问题,具体言之,在未能对儒学如何界定其自身以自主,认知世界以定位,面对历史与未来以承先启后与创新发展,不能发为非常可观印象深刻之论。我对此一问题的看法是我们必须重新掌握儒学的本体论与体用论的大架构,再进而认识儒学自古就包含于本体论中的时中方法论与实践论的大思维。对于此等论述,我在其他著作中已有发挥,在此我只想提出一个可行的简易的纲要以为我人思考问题的指南。

一、分辨本、体、用的层次,把本体论与体用论联系起来。过去讲本体论往往流入抽象,未能进行分析的理解与应用,讲体用论又容易落到即体即用,体用含糊不分的状态。现在我们必须把儒学中较后发展的综合概念“本体”结合与较前发展的分析的概念“本”与“体”来进行知识层次上的区划与整合。本是指的根源,本体上的本的根源不止是历史性的也是形上学的:它代表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本源,也是宇宙持续发展的动力。“知本”或“明本”就是要掌握此一根源意识,体验生命的内在活力而坚强刚毅的发展,这是对人的世界的肯定,也是对人的未来的信念。在此肯定与信

念的基础方可建立以人为本,也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本体的伦理学,再引发出人的生活美与精神美的伦理学,环境的伦理学,医疗的伦理学,经济管理的伦理学,科技工程的伦理学,公共行政的伦理学,民主政治的伦理学等等。这些伦理价值的建立与肯定就是对本体论的体的发展,所借助的不只是个别及集体人的身心的经验的直觉与体认,而且是广泛的理性与精致的逻辑与数理,以便于仔细的分析与切实的综合。我们要求其全,要求其开放,要求其深刻,要求其有生命活力。有了本与体的贯通,再进而求其用。

本体的用的重点落实在管理上面。管理也可以称为本体之用。用是直接以具体事物为对象,采取有计划的行动以追求与达到一个预订的价值目的。由于对象不一样,目标不一样,计划的方案与运用的策略自然也可以不一样。人的世界本来就是一个目的性的与追求目的性的世界,因之是一个人的行为与行动的世界,可说是一个人之用的世界。但如果没有体的意识,没有本的体验,或没有本体的思考,生活的日用平常有其自然性,有其不自觉性,但却无法取得理念性与理想性的跃进与改革。更无法获得一个整体的贯通以及持续不断的动力的支援。人类的发展必须要有理念性与理想性的引导,也就是人类心智的作用,才能做到尽人之性以尽物之性,解决超越个人能力以外的群体性的问题。此类问题包含环境适应与利用问题,自然灾害与危机处理问题,社会安全与人力资源开发与组织问题等等。此等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可说为本体的大用问题。大用仰赖于大体,而大体仰赖于大本。本立而道生,所谓道就是体用的一贯。

二、分辨知时、命时(正时)与用时(即时中)的时段,以求得在时间过程中实现人之为本、体、用的功能。儒家哲学是建筑在时间与生命的体会的智慧之上的,是有关时间与生命的哲学,是在时间中发现生命,在生命中掌握时间的哲学。对于时间与生命的理解,从一个古典儒家形而上学的观点,可以诠释时间为命,诠释生命为性。孟子对性命进行了深刻的理解与诠释,以命为“莫之致而至者也”(孟子万章上-6),以性为人的能动性与自主发展性,正是生命意义之所在。所谓生命就是以生为命,以命为生,在时间中合生与命为一体。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以“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来说明“立命”的意义与重要性(宋代张载对立命更有所发挥)。立命也就是顺受命之正者,尽其道而死,此也可称之为正命(见孟子尽心上-1,2)。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体、用具有时间与生命上的一贯,发挥本、体、用的意识与智慧也有时间与生命上的一贯。下面我将说明孟子所说的“立命”或“正命”就是我说的“命时”,即是对时间生命加以理性的规划与意志的实践之意。

除却孟子,此处我提出儒家哲学中的时间与生命哲学是基于古典儒家尤其是孔子有关易的哲学的发展。对此我也另有为专文加以阐述。此处我要强调的是此一易的哲学(时间与生命的哲学)的方法论命题:认识时间的本质为变化,从变化的体验中认知变化的规律与可能,进而认识与计划参与及推动变化的可能,观察与创造变化的契机,实行改良与跃升。此一时间与生命方法论的命题显然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是知时之为时,是知时义或时的本体,是为知时,这是第一阶段。其次,透过人的思考与知识或经验,掌握具体事物的一般与特殊的发展方向与发展可能,以判断何时何地(空间为时间的展开与实现)或何等状况之下何种事件将能发展与发生,因之何时是何等具体行为实现的最好良机,此可明之为命时。

最后,基于对时间本体的体会以及基于对时间发展的策划(也可说为一套实践与改革的策划)的把握,等待恰当的时,或寻求恰当的时机,投入实践,发挥人的创制与创造的机能,在一定意义上以获得最大的成功或成效。此之谓为用时,也可说为中时,或曰时中。易传重视时中的概念与精神,中庸事实上说的也是时中及中时的作用。两者都来之于孔子对时间与生命的体验与追求时中的精神,此一体验与追求又来之于对周易的理解与思考。如以中庸之庸为用或为平常平庸之用,中庸之精义就在说明如何花时间为日常或平常之用,也就是日用平常。如何把天地本体的创造力与人之为人的创造性化为日用平常的用就是时间与生命实践方法论的核心课题。

结合以上本体用的本体论来说此一时间与生命的方法论,我们可以看到知本就是知时,立体就是命时,而致用则是用时或时中(时中)。时间与生命既是本体又是方法与过程,本体论必然导向方法论,而时间与生命的方法论则又必导向时间与生命的本体论。两者可以分析的理解,又可综合的发用。分析与综合的交相为用,正是本体与方法,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交相为用,更是时间与生命的交相为用,两者在时间——生命——实践的过程中交相完美与完成生命的使命。简单的结论是:我们必须知时以明本,命时以立体,用时以致用。

三、促进人类道德:基于以上的儒家哲学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创新理解,我们不能不重视人类道德的建树与维护。此即是对生命的本体的价值的认知,体现在多元文化传统中人类追求的多元价值体系之中,其中包含人的尊严,人的平等,人的自由,社会的和谐、开放与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与可改性,生活的自足与安全,生命的健康与充实等等。此即是人性的实现。儒家的本体论体现了这些价值,也体现了实现人性价值的理性手段的必要性。两者完全可以从以上所说的时间与生命的

